

# 华侨与侨乡的现代化历程

## ——以泉州为例

○蒋楠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华侨被公认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有过卓越贡献, 在侨乡泉州, 这种贡献尤其明显, 甚至是侨乡现代化的绝对主力。但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并不只是发展, 近代中国在现代化中面临的困境在侨乡以特有的方式被缓和、消解, 比如部分抵抗了近代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及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权力网络。华侨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与知识精英阶层有所不同, 不宜对华侨对侨乡的现代化影响有想当然的过高估计。

**关键词:** 华侨; 泉州; 侨乡; 现代化; 内卷化

**中图分类号:** C912 D6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 (2010) 04-0030-07

侨乡, 是中国独有的概念, 侨居海外数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华侨华人与故土之间有如此深的羁绊可说是世所罕见。华侨一词在 19 世纪末开始通用, 华侨的合法身份此时为清政府所承认<sup>①</sup>, 作为海外华侨主要祖籍地的闽粤两省也就形成了许多侨乡, 泉州正是福建省的第一大侨乡<sup>②</sup>。随着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研究热点, 而且多关注华侨对中国或侨乡的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依然关注的是华侨对于社会经济贡献, 对于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研究重点落在了经济发展、社会观念革新上, 宗族体系、民间信仰体系的保留单纯地被视为连接海内外乡情的需要。

现代化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剧烈、最深刻的变动, 它绝不是一帆风顺, 亦非“发展”二字所能简单概括。华侨, 一般被视为侨乡现代化的先行者和最大支持者, 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

收稿日期: 2010-03-05

作者简介: 蒋楠 (1980-), 女, 福建泉州人, 历史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区域史、华侨华人史研究。

① 五口通商后,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中有关契约华工的内容事实上允许了华侨可以自由往来故乡与海外, 华侨回乡不再受到限制。到 1893年, 有关华侨禁令的法律也被废除, 华侨身份完全合法化。见郑一省.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绪论。

② 根据 1988年统计资料, 泉州市华侨总数为 463.8万人 (见《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人口民族图组”,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4 版), 远远超过福建省其他地市。

研究的认同, 华侨对故乡的公共事务十分关心, 通过支持革命和建设获得了新精英、新士绅的身份使他们更容易影响故乡的公共事务。本文试图以泉州侨乡为例, 论述华侨不仅是泉州侨乡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大助力, 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抵抗了中国在 20 世纪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政权内卷化<sup>①</sup>, 帮助保存公共空间, 以及存留部分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言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

## 一 华侨对泉州侨乡现代化的主要贡献

华侨对侨乡现代化的贡献, 主要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公益文化事业三个方面。

华侨对泉州侨乡政治现代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辛亥革命的胜利上。晚清政府在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中, 建立了近代军队系统、警察系统等, 以强化现代国家的监控手段<sup>②</sup>, 但是海外华侨却有天然的优势脱离这种监控, 同盟会进行辛亥革命所仰赖的两大力量——会党和华侨——都在国家的控制之外, 因此作为一股监控外的力量, 华侨首先帮助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泉籍南洋华侨参加革命的, 主要有蒋报策、蒋报料、蒋以麟等起于印尼泗水, 他们加入光复会并创建明新阅书报社来宣传革命思想, 还曾于 1908 年举办明崇祯帝追悼大会以唤起民族意识; 又有吴世荣、吴文楚、陈新政等起于檳城; 泉州地方的革命名人许卓然, 因曾旅居新加坡而在南洋接受了革命思想, 回国后加入了同盟会, 为泉州最早的同盟会员。1911 年, 蒋以麟受泗水同盟会机关委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回泉州后陆续和许卓然等革命党人和吴文楚、杨光练等华侨革命志士取得联系, 9 月初泉州地区的同盟会组织成立, 蒋以麟被推为会长, 并在当年底顺利光复泉州。福建沿海福厦漳泉几个城市的光复, 都有南洋华侨的巨大贡献, 南洋华侨几乎承担了光复所需要的全部经费, 蒋以麟所属的泗水蒋氏家族提供了厦门光复所用的饷款 14700 余元。华侨是泉州辛亥革命的第一大功臣, 虽然在革命成功后他们并未进入地方的政治权力中心<sup>③</sup>, 但随着华侨在辛亥革命后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因此在泉州乃至全国, 华侨乃是一股独立在政府之外, 与民间保持密切关系又不同于真正的民间的政治势力。

辛亥革命胜利后, 华侨又帮助泉州侨乡解决了民军之害。

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 福建就进入军阀民军肆虐的时代。从 1917 年到 1926 年, 泉州南北军阀混战十年, 1927 年北伐军路经泉州, 虽然制止了军阀混战, 但此后的四年里泉州名义上是受“国民政府”统治, 实际上是“民军世界”。民军与土匪无二, 这些民军私设苛捐杂税, 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到处绑架百姓以勒赎金, 如有反抗就大兵压境进行烧杀抢掠。在泉州肆虐最久、为害最深的是名为“民军”实为土匪的高为国、陈国辉等部。高为国等民军在泉州的横行无忌以及地方百姓的求告无门, 迫使泉州乡里以承袭自明清的乡兵民团的基层军事化传统来保护自己, 泉州基层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华侨牵头、华侨出资为后盾的乡间民团自卫组织。

民团的起源就是乡族械斗, 由乡族武装发展而来, “民初闽南地区的民军四起与军阀割据局

①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一书中借用了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内卷化”概念, 用来说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 否则扩张中依赖来推行政策的非正式机构会渐渐脱离国家控制, 变成赢利型的国家经纪。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 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 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见《文化、权力与国家》第三章)换句话说, 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在乡村只有榨取而无建设, 而这种榨取必须依赖于榨取手段更高的不受国家控制的非正式机构。

②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 “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丛结’共有四种: 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巩固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作为‘政府’权力的监控的集中化过程, 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种现代国家现象。”见[英]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 赵力涛, 译. 三联书店, 1997: 6, 59.

③ 辛亥革命后, 泉州同盟会的许多成员都认为应该“功成身退”, 如新加坡华侨庄汉民, 在泉州光复后“不居官, 往厦门从事对南洋贸易”(《庄汉民传》, 《泉州文史资料》第九辑)。作为泉州光复主力的树兜华侨、同盟会长蒋以麟, 亦往鼓浪屿休养, 此后以行医为生。

面实际上也是乡族割据的进一步发展”<sup>[1]</sup>，但当民军危害到整个地方社会时，华侨主导的乡团就担负起了保卫家乡的使命，原本械斗越严重的地区乡团越强，华侨力量越强的侨村乡团力量也越强。泉州府城南门外的富裕侨村树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由其乡中侨领导导的著名的晋南联乡保卫团曾数次打败了高为国的武装。1920年，树兜村乃联合附近各村组织乡团自卫，由印尼泗水华侨蒋报企、蒋报察兄弟各出资5000元，以原八乡会为基础，联合几十个村落的乡民，组成“晋南联乡保卫团”，并推举华侨、前泉州同盟会会长蒋以麟为团长。后来，晋江南部的青阳、石狮等镇及其附近乡村也纷纷组成保卫团与晋南联乡保卫团结盟。1929-1930年，晋南联乡保卫团第三次组团三袭高为国，同时泉籍华侨和侨乡人民无数次函电南京政府，要求剪除高匪，高匪被迫北上闽北，最后在泉州各界与华侨的强烈要求下，高为国于1932年8月27日被枪决。至于另一个民军头子、“闽南王”陈国辉的覆灭，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旅居菲律宾的闽籍华侨为主，在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领导下发起闽侨“救乡运动”，最后通过十九路军成功解决。当时李清泉等组织福建自治会，在菲律宾召开大会，提出“驱逐军阀李厚基；联络各自治团体，整肃民军民团”三项主张，此即救乡运动的开端。

华侨对侨乡近代政治的贡献，使得他们在这个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每股力量都试图取得华侨的支持，比如十九路军，由于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华侨也总是站在他们眼中认为对故乡、对国族有利的一方。

工商业投资历来是华侨对侨乡贡献的重要内容。在侨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中，华侨不单是以侨汇为维持泉州经济消费提供资金，基于“实业救国”的感召，华侨亦投资乡里，发展近代工商业，泉州的旧城改造和公路建设都有华侨的参与。在近代的福建经济中，最大的投资来源就是华侨。据调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1957年止，华侨直接投资在泉州工商、交通、文化和其他事业的共有178个企业或单位，大约占泉州1956年工商各业总户数的30%左右。由华侨投资建设的泉安汽车公司和1923年通车的泉安公路的建设在泉州近代化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一笔。在直接投资之外，由于南洋华侨在外辛苦获得的财富通常交予亲着族人经纪处理，或者经由侨批局、存入钱庄变为借贷资本，因此间接受益于华侨资金的工商业数字亦十分可观，据泉州工商业人士估计，解放前泉州工商业户百分之七十以上或多或少地利用或者借用侨汇、侨资以维持企业的经营活动。

华侨倡导了从1923年开始的历经十五年的泉州老城的改造。1923年泉安公路建成通车，在归侨陈新政、徐剑虹、戴愧生等人的促成下，以刚从菲律宾回国的泉州辛亥革命名人、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叶青眼为中心，组建了泉州市政局，着手按当时的近代化理想进行老城的拆除改造，泉州因此失去了一部分旧城墙，而得到了一条新式的中心马路，残余的旧城墙在抗战期间完全被拆除，泉州老城中心的中山路则充满了来自南洋的异域风情。

华侨贡献的第三个方面是公益文化事业。在泉州近代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上，华侨几乎是绝对主力。近代化建设启动后，许多新的公共产品，如近代卫生事业、市政建设、学校教育等，理论上应由各地政府来提供。然而从清末到民国，由于国家财力的不足，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情况不尽如人意，而在泉州这样的侨乡社会，华侨以集体之力在许多方面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华侨成为泉州侨乡社会公共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他们对侨乡公共事务的参与之深，证明他们不脱离于侨乡社会，即使身在外乡，依旧是侨乡社会的成员，若以“公共领域”为比拟的话，华侨的活动不仅拓展了所属社区的边界，甚至将侨乡的公共领域亦拓展到了海外，在海外营造出一个为侨乡服务的公共空间。

华侨资本首先在泉州修建了泉安公路、泉秀公路等工程，改造了旧城，为基础建设的公共产品出力。但是在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上更明显的是各种公共事业，华侨在泉州兴办、支持了许

多公益事业,包括学校(1935年时,泉州下属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由华侨华商创办或参与捐助的小学共732所,1935年,晋江全县教育经费约47万余元,而当时县政府拨款只有3万元,其余的全部来自华侨的捐赠<sup>[2] 102-103</sup>)、赠药处、养老院等等,在政府力量所无法做到的地方弥补了空缺,是泉州非盈利事业的先驱者。花桥善举公所的资金主要来源就是华侨。连受教会资助的教会医院惠世医院,也必须向南洋募捐才能维持运转<sup>①</sup>。

慈善事业的办理也是以华侨为依靠,在管理上,有海外董事会(开元慈儿院有新加坡、马六甲、菲律宾、仰光四处海外董事会,国内外董事会再组成海内外联合董事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侨乡事务实行“遥控”。在经费上,政府办理的慈善机构,在政府无力负担这些救济机构的经费时,维持这些机构的任务就落到了华侨身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经费更是大多由华侨解决,比如泉州妇人养老院主要经费来源有三:一为旅菲华侨吴记霍捐助的泉安汽车公司股份一万元逐年收入的股息,一为南洋各埠华侨汇来捐助及各在地董事补助,一为市内院产所生利息。开元慈儿院,则有在檳榔屿赞助委员会,由各董事会在南洋的产业提供经费。

## 二 华侨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民国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一种现代化的窘境。19世纪中国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为了抵御民族危机,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模仿的就是现代国家的运作模式。自20世纪初以来,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对基层社会的政权进行逐步改造,受西方的影响,国家竭尽全力地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清末新政就是国家权力企图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20世纪中国所有存在过的政治权威,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性政权,都在企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国家的行政机构在向乡村社会延伸,村官从职役<sup>②</sup>再度变为国家官僚体系内的工作人员,基层的警察制度也建立起来,这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监控、控制的强化。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并没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控,反而各地固有的力量在消解国家的努力,或者令其产生异化。首先是国家用于现代化启动的资金有限,由于晚清民国时期财政改革未到达预期效果,机构不断增加、雇员数量变得庞大,新增的开支需要和投资需要令赋税也不断增加,但实际上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却在减少,行政效率低下,国家不得不借助于赢利型经纪人<sup>③</sup>来维持对乡村财源的榨取<sup>④</sup>。这就是杜赞奇以华北农村为例论述的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sup>⑤</sup>,与此同时,往日维持农村安靖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也被现代国家日渐破坏。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意思是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文化里的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他们可以成为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

① 陈石:《惠世医院了解情况报告》,1951年,泉州档案馆藏。

② 在宋代,乡官完全转变为职役,见《文献通考》卷十三,《职役二》,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③ 杜赞奇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济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另一类为“赢利性经纪”,他代表外部政权对乡村进行侵犯和压榨,并从中牟取自己的利益。

④ “国家政权的扩张和内卷化”,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66-76.

⑤ “更广泛地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见杜赞奇上引书,第67页。

信仰、居民之间的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传统中华帝国时代,乡村社会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体现在民间宗教和宗族组织之中。国家利用文化网络深入下层社会,下层社会的文化网络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正统性支持<sup>①</sup>。具体到乡村里,就是被人们利用来作宗族组织的宗法制度,以及乡村民众膜拜的那些被国家所承认列入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庙宇,都是传统国家权力在乡村一级的文化象征。在现代化国家向乡村延伸国家权力之前,乡里村社的自治就是凭借这些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展开,村民在家族祠堂和乡村庙宇里进行乡村自治。杜赞奇认为传统时代的乡村领袖可归入保护型经纪一类,他们往往以传统文化权力网络作为其威望来源,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国家权力符号在乡村的延伸,他们的权力来自乡村内部。换句话说,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乡村精英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sup>②</sup>。但是20世纪国家在侵蚀地方权威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网络的这些资源,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偏见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于是这些文化权力网络无法继续在国家权威的名义下赋予那些乡村精英、乡村领袖以领导乡村的合法性。而政权内卷化的既要支付巨额赔偿,也要支持无休无止的混战,这导致了官僚机构对底层财源的强化压榨,也令乡村领袖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

在政权内卷化和传统文化权力网络被破坏的作用下,华北农村为赢利型乡村经纪所控制,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土豪劣绅。在民国时期,现代化投资的匮乏、村级官吏的土豪劣绅化、军阀、土匪的长期骚扰成为许多地区共同的窘境。但是华侨的存在,却令侨乡社会在类似的窘境中得到纾解,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的情境下,帮助保存了部分文化网络,延伸了基层社会的公共空间。

华侨在这种现代化窘境中的第一种特殊作用就是帮助抵抗了国家政权机构的内卷化。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需要启动资金,需要获得持续的投资<sup>③</sup>。晚清和民国时期,内卷化的政权根本无法给予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工程投资。在泉州这样的侨乡社会,不仅工商业投资主要来自华侨,现代化的工程改造,比如中山路和泉安公路的投资由华侨提供,教育、卫生、文化的公共产品也多由华侨提供。泉州平民救济院,其开办费及经常费一开始由县政府比照警捐数目向市上店铺征收<sup>④</sup>,但后来警捐抗交的很多,平民救济院的经费遂陷入困难境地。1934年开元慈儿院院长叶青眼兼任救济院院长,以向南洋募捐来满足需要。当泉州侨乡为土匪、民军所困时,由华侨领导的民团自卫武装和菲律宾闽侨救乡会又挺身而出,解了故乡的燃眉之急,他们在事实上充当了故乡的保护人。

华侨在泉州侨乡的第二种特殊作用是帮助保存了传统文化的权力网络。晚清以来的现代国家构建中,对乡村社会的侵蚀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做法体现在民间宗教、神庙祭祀系统和宗族的权威被国家不断侵蚀,传统文化网络在国家权威层次上的合法性因此日渐削弱。这种削弱与对基层社会的监控一起,在新中国建立后达到顶峰。但是由于华侨的存在,在整个20世纪泉州侨乡的传统文化网络并没有因国家的侵蚀而毁坏殆尽,它甚至至今仍在起作用,反而华侨经常藉由此传

① 见杜赞奇上引书,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

② 见杜赞奇前引书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③ “在现代社会,每年国民产值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用于再投资,以推进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形成对照,在传统社会,只有二十分之一或更少的国民产值用于再投资。”见[美]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7-18。

④ 《民国晋江振济会档案·慈善团体立案卷》:平民经常费用系由本市各商户每月按照警捐比例补助,初时系由院派员直接征收,民国廿五年九月奉命由县经征处统收每月拨助三百元,隔年八月因抗战期内减为二百。廿七年县长何核定为经费七十元口粮每名每日乙角。廿九年口粮增至三角,无其他基金及产业。

统文化权力网络对侨乡的近代化历程施加影响。近代华侨对故乡公共事务的干预,经常继续依托旧有的社会资源,其中最重要的依旧是乡族网络与血缘、地缘。华侨华人虽然在海外也因民族主义和近代化的影响发展出新式的华侨社团去参与故乡的公共事务,但他们与故乡基层社会之间的首要的联系纽带依旧是传统的,是基于乡族和信仰的纽带。

泉州侨乡海外华侨在身份不合法和中国尚未开始近代化国家建设时,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修桥铺路,资助乡亲,建设祠堂庙宇上。华侨对于故乡公共事务的干预,一开始都是通过这途径在进行的,现代化国家政权开始建设后,华侨对侨乡现代化的影响,才开始部分经由这些现代机构进行,但是传统的途径仍然保留了很多。比如华侨在自己乡村里的捐建的学校,庙宇、祠堂,依旧要依靠村里的老人、长老、头领才能作成,华侨在故乡创办教育事业往往以乡族学校为起始。华侨的革命活动以家族、地缘为纽带也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在泗水蒋氏家族及其邻村姻亲是泉州华侨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泉州地区最大的慈善组织——花桥善举公所——依托民间信仰系统的善济铺庙花桥慈济宫而建立。最好的例子是晋南联乡保卫团。这个组织基础是旧有的当地乡族联盟八乡会;树兜乡过去素因乡小而受到临近强宗欺压,该村的归国富侨蒋报企、蒋备庭等有意振作乡里,所以树兜就与邻乡上春两村联合起来,再加上同会帮的新门外浮桥、高山、店头、古圳、赤涂、新石(新宅与石龟头)等共同合为八乡会,这些村子都属于清代以泉州府城为中心的东西佛分类大械斗中的西佛会帮,在这个乡族联盟中,其财政由树兜负责的部分高达40%。

而由于华侨的关系,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国家终于有了比较强大的控制基层能力的新中国,所有慈善机构都被归为公立,却有泉州花桥慈济善举公所这个在建立、资金运作上的依仗华侨的慈善机构,继续保持了它民办的身份,在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继续接受华侨资助,而且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例,可以与它的历史相媲美的就只有澳门的同善堂。而改革开放后侨乡各种民间信仰、宗族组织的迅速复兴,无疑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密切关系,花桥慈济宫慈善机构和各类民间信仰庙宇、宗族组织得到了来自海外的大力支持。

### 三 结 论

侨乡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下,不可能独善其身,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不能以发展一词完全概括,与现代性相伴随的,并不总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这些美好事物。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历种种阵痛与波折,现代国家的构建也总是倾向于颠覆传统社会那种稳定而自得的社会结构,或者破坏某些延续了数百年的生活方式。而传统性与现代性又非总是对立<sup>①</sup>,有一些传统已经被事实证明它可以顽强地适应现代社会。在侨乡的现代化历程中,华侨既帮助侨乡抵抗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缺乏现代化启动资金这些波折,充当了故乡的保护人,也部分地保存了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令其至今仍在发挥效用。

新中国建立后,因东南亚民族国家纷纷建立,中央政府遂改变了过去的华侨国籍认定方式,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大批华侨被迫改变了自身的国家认同,归化为侨居国国民,身份向华人转变。在这种情势下,华侨华人要继续对故乡施加影响,该强调的就是文化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并不像国家认同那样在政治上有其敏感性,那么华侨华人就依旧能够通过传统的家族、地域、信仰的网络与故乡保持着联系。

<sup>①</sup> 按照(现代化理论权威)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的观点,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见[美]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M]. 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前言:18

参考文献:

- [1] 郑振满. 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演变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 (1).  
[2] 福建日报社. 八闽纵横: 第二集 [M]. 福州: 福建日报资料室, 1980.

## Modern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 Taking Quanzhou as an Example

JANG N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Huaqiao Univ.,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were recognized to hav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Quanzhou, these contributions were particularly evident, and even formed the absolute main driving force. Howeve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was not just development. The modernization dilemma faced by China was eased and digested in a special way, such as the state revolution partly resisting state power and the power net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ir understand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is different with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Quanzhou; Hometown; modernization; state revolution

【责任编辑 陈雷】

### 本刊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 扩大广大作者学术交流的渠道,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作者提成与本刊印刷版稿酬一次付清。如作者不同意所著文章编入《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请在来稿时声明, 本刊将作适当的处理。